

司马迁研究新论



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



11(2)/41

1034412



司马迁研究新论



B0091012

1034412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郑州

司马迁研究新论

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

施 丁 陈可青编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32开 13.75印张 317千字
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 — 5,000册

统一书号 11105·49 定价 1.56元

内 容 提 要

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历史家，他的名著《史记》在文化史上有崇高的地位，对史学有杰出的贡献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古今中外有许多学者研究司马迁，作出了很大的成绩，本书就是近年研究司马迁的新成果。

《司马迁研究新论》对司马迁的史学思想（历史观、政治观、经济观、社会观、学术观等）、历史编撰、历史文学，以及司马迁与班固两大历史家的史学异同，作了较为全面的、实事求是的评论，提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新观点和新看法；同时还将二千年来我国学者对司马迁的研究和评价，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评论。本书可供历史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，也可供文学、哲学、文献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参考，还可备爱好我国古代史学、文学、哲学的青年同志阅读。

前 言

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，他所写的《史记》是一部不朽的历史著作，对史学有杰出的贡献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自司马迁以后二千年来，中外学者有不少人研究司马迁与《史记》，留下了丰富的遗产。近三十年来，我国学者逐步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，对司马迁与《史记》重新作了研究，取得了很大成绩。时代在前进，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，近几年，学术界对司马迁和《史记》的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，可以预料，其成果必将是会更大的。

本书就司马迁的历史撰述、史学思想、历史文学、马班异同，以及历来学者对司马迁的研究和评价等方面或角度，作了一些新的探索；所收的文章，有的已发表在各种报刊上，多数尚未发表过。本书系根据白寿彝先生的意见编辑而成，并征得他的同意，将《司马迁与班固》一文作为序言。本书在編集过程中，得到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热情支持，在此谨致谢意。

编 者

目 次

司马迁与班固（代序）·····	白寿彝（1）
论司马迁的“通古今之变”·····	施 丁（17）
司马迁的历史变化观及其对人物的评价·····	陈可青（48）
论司马迁的历史哲学·····	赖长扬（59）
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进步性·····	陈其泰（93）
论司马迁的社会经济思想和历史观·····	陈可青（103）
司马迁对专制主义弊病的批评·····	陈可青（128）
司马迁写“今上（汉武帝）”·····	施 丁（137）
读《五帝本纪》札记·····	陈可青（163）
太史公书凡例考论·····	陈可青（168）
马班异同三论·····	施 丁（208）
关于《史记》的整理和研究·····	陈可青（369）
论刘知几和章学诚之评司马迁·····	施 丁（381）
三十种《史记》研究书目提要 ·····	陈可青、杨燕起、赖长扬（396）

司马迁与班固

(代序)

一、时代的特点

司马迁和班固都是汉代的人物。司马迁是在西汉，班固是在东汉。

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。生产工具、生产技术和劳动力与过去有显著的不同。封建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中占了支配的地位。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抗，成为基本的社会矛盾。

两汉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。从生产工具、生产技术方面看，农业、畜牧业、水利工程都有很大的进步。冶铁、煮盐和纺织工业也和过去不同了。漆器工艺大不一样。造纸有了新的发明。造船工业大发展，已经能造很大的海船。

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，由于生产的需要和长期研究的积累，一些相应的学科发展了。天文学、数学、医药学，在两汉时期，初步形成了它们的科学体系。这种发展，不是偶然的、零零碎碎的，而是在许多部门都有明显的进步。

从劳动力方面看，社会劳动中，主要的已经不是奴隶劳动力和农村公社劳动力了，而是具有一定人身自由的、有比较高的劳动兴趣的个体农民的劳动力。这种劳动力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劳

动力与土地相结合；一个是耕织结合的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。这就是说，一个农民得到一块土地，老在这块土地上劳动，这块土地可以私有，也可以占有，由他使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比奴隶的被迫劳动和村社农民在村社公地上轮换耕种的积极性高。农民和土地结合，也就为地主保证了劳动的人手。耕织结合的个体家庭内部，有了生产分工，在比较好的条件下，吃穿可以自给自足。这两种结合，对于农民的生产兴趣是有刺激作用的。个体家庭是分散的，不易组织起来，他们作为劳动力被地主阶级掌握以后，就成为封建经济不可抗拒的基础。这时候的生产工具、生产技术和当时的劳动力相结合，就使奴隶制生产力转化为封建制的生产力了。

两汉时期封建的等级所有制和两个阶级的对抗，在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、珠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矛盾中，都占有主要的地位。当时的地主阶级带有等级制的特点，农民阶级也带有等级制的特点。

地主阶级中，除了皇帝是最高地主以外，有封建贵族地主，称为世家地主，有豪强地主，还有高资地主。世家地主有比较高的爵位，如王、侯、君，都从国家那里受封，得到土地，也得到农民。这是封建贵族里很重要的一个阶层。他们中间包括宗室（就是皇帝的本家）、外戚、功勋和学术上的贵族儒宗。根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西汉末年全国的总户数和人口总数与诸侯王的总户数和人口总数（包括估计侯国的总户数和人口总数）之比，是四比一。东汉时候，全国户口数下降，诸侯王的户口总数和人口总数的比例上升到四分之一以上。世家地主都有特权，除接受国家封赏的土地以外，还用各种手段侵吞老百姓的土地，数量很多，但无法查考。从两汉的记载看来，世家地主掌握全国

户口中这样大量的劳动力，说明他们在地主阶级中，占有主要的支配地位。过去说，秦始皇“废封建，立郡县”，实际上，他并没有完全废除“封建”，诸侯国依然存在，“封建”还是很严重的。他们有土地，有农民，收赋税归他们自己。世家地主是封建地主阶级内很强大的一部分。

豪强地主包括六国之后和地方大族。六国之后在秦汉之间活动的能量很大。秦末农民起义时，好多六国后裔参加，而且夺取了农民军的领导权。六国之后原为贵族，秦灭六国，这些人身份转化为豪强，他们在地方上有势力，在政治上无地位。地方大族也是在政治上无地位，在地方上势力大。如东汉初年，四川一个地方大族，家奴有一万人。地方大族的土地、人民都不是国家给的，而是靠祖上传下来的。他们常常与封建贵族发生很多矛盾。另外在边境上也有豪强地主，如班固的祖先在北方掌有牛羊几千群，这不是地主，而是豪强牧主，力量很大。

高资地主也叫富人地主。家财的数量较大，一般要有约三百万才算高资。他们中多由于做生意，进行商业活动发财致富，赚钱买地，成为高资地主。他们在法律上无地位，受压。汉初规定他们不得穿丝衣，不能坐马车。但他们的实际活动能力很强。

地主阶级的等级制特点，从对土地的权力上说，皇帝拥有对全国土地的权力，世家贵族分享了皇家对土地的权力，豪族地主享有被皇家承认了的自己已有土地的权力，高资地主基本上是在非法的情况下取得了土地。

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，说东汉是“豪族政权”，这不确切。刘秀起兵时，有相当一部分“豪富”参加。“豪富”，是豪强和高资地主的总称。但刘秀称帝后，他们都转化为贵族，已经不是豪强地主和高资地主了。而且他们跟豪富之间还有这样那样的矛

盾。

农民中也有等级制。秦汉有二十等爵的制度。老百姓也有取得爵位的机会。爵位不同，身份也就有高低。司马迁说：“凡编户之民，富相什则卑下之，佰则畏惮之，千则役，万则仆。”农民本身，因财产的不同，社会地位也不同，而且会有各种不同情况的分化。

等级制是封建社会的特点。等级不同，土地权就不同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里论述所有制形式，说“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。”封建的所有制是跟等级的所有制密切地联系起来的。《共产党宣言》说：“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。”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往往遮盖了阶级的视线。

两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代。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已有封建关系，但不象汉时成熟。两汉以后的社会变化，也不象汉时变化这样大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在中国三大流域内，才能基本统一，并在语言相同、地域接近、民族意识增长的条件下，形成了汉族。在这样的时代，学术文化方面取得了大的成就，产生了两个伟大的历史家——司马迁和班固。在他们以前，历史著作还没有与作者个人的名字结合在一起。《春秋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，传说为孔子删修，现在还有问题。《左传》至今不知是谁作的。《史记》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以个人名义与成就结合的历史著作。

司马迁所处的时代，是西汉建立六、七十年，汉武帝当政时期。早在秦皇朝已灭，汉皇朝新建的时候，在统治阶级内部总是提出这样一些问题：秦皇朝为什么灭得那样快？汉皇朝为什么兴得这样快？楚的优势为什么很快失去？汉为什么能以弱胜强，得

到天下？到司马迁的时候，汉皇朝已达鼎盛时期，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：秦皇朝那样强大，为什么二世而亡？政治家问，思想家也问。这个变化既是理论问题，也是现实问题。汉皇朝今后怎么办？历史会怎样发展？这样思想的出现是很自然的。司马迁的历史著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，根据这个时期的特点，他必须回答这个问题：为什么会发生秦汉这样的变化？

班固的时期不同了，已是东汉前期转到中期，经过光武帝、明帝、章帝，政局比较稳定，逐渐转入后来外戚、宦官当政的长期动荡局面。汉武帝时，董仲舒提出“独尊儒术”，他不但要从经济上、政治上，而且要从思想上、文化上统一。他提出：第一，思想上大一统；第二，皇权神授；第三，实行“三纲”。封建社会的基本秩序已经明确。从汉武帝、董仲舒，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，儒家思想的神学化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套。在白虎观会议上，儒生聚会，皇帝亲自出席，听取各派辩论，皇帝自己决定是非，这是以教主的姿态出现。这说明，皇家提倡的那一套，到这时候已达到最高峰，达到强化阶段了。班固参加了白虎观会议，他承担的角色是，奉诏写成一部《白虎通》，把那些儒家的议论综合到一起，成为最后的定稿人。班固不是象司马迁那样，去答复历史怎样变化发展，而是去答复如何维持目前的局面。他们承担的时代任务不同，因而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异。

二、马班的异趣

司马迁是龙门（今陕西韩城）人，班固是扶风安陵（今陕西

咸阳附近)人。今天看到的二十四史中,第一部就是《史记》,是司马迁著。第二部就是《汉书》,是班固在《史记》之后写的。《史记》写了黄帝到汉武帝之间的历史,共一百三十卷,包括几千年。《汉书》写了汉高祖刘邦到王莽之间的历史,共一百卷,包括二百三、四十年。

《史记》有很大的创造性,它把过去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等书中所不能包含的材料,都包含进去了。过去基本上按年编,按时代顺序编,遇到无年月的材料就不编。甚至有的大事,年月不可考,也无法编进去。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对一些历史人物,社会上不少的活动,由于年月不可考,写不进去。《史记》开创了新体裁,有本记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。

本记,基本上是编年体,也不完全是。内容是一些大事的总纲,也包括帝王个人的事迹。

表,有年表、月表,把各地区的政权,不同地区的活动或相互交叉的活动,按年月编起,彼此参照。

书,是社会制度、专题的综合论述。

世家,是记诸侯国家或如孔子之类在历史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。

列传,是记社会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。

《史记》全书,规模宏大,远非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所能比拟。有的体裁如“书”,是过去已用过的,但不是用于记载历史。司马迁结合历史,发展了这些体裁。

《史记》只写到汉武帝。后来有很多人续《史记》,光是有名有姓可考的,就有十几个人。班固的父亲班彪就曾作过续《史记》的工作。

班固所处的时代是在西汉结束以后。《汉书》写了从西汉建

国，经王莽失败，到光武继位，正好断代。他开创了断代史的新体裁。《汉书》一百篇中，有五十几篇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材料，单是列传就用了四十篇。世家没用。发展了书，改为志。后世人谈到重要的历史著作，都要谈到司马迁的通史和班固的断代史。马、班都有很大的贡献。

司马迁和班固在历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，但二人很不一样。因为他们二人所处的历史时期不一样，他们要回答的问题也不一样，他们有不同的思想，有不同的学风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对朋友说，他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所谓天，往往是指时势（在历史变革方面）和际遇（在个人关系方面）。

“究天人之际”就是研究历史的发展。中心是“通古今之变”，把古今变化的道理弄通，目的是为了将来。他要拿出自己独到的见解。

班固是把西汉的事写出来，“综其行事，旁贯五经，上下洽通”。就是说，把西汉的世事整理出来，用五经的道理将上下二百年的历史妥贴讲通。

司马迁研究的是社会发展历史变化，这是他的主题。班固要旁贯五经，想要通过历史进行说教。他们答复的问题不同，所抱的目的不同。司马迁是要弄通历代变化，找出历史经验。班固是要通过历史说教，巩固皇朝统治。清代大历史家章学诚说：“迁书通变化，而班氏守绳墨。”“迁书体圆而用神，班书体方而用智。”“体圆”是灵活运用，不拘泥。“神”，是传神，即发扬历史发展过程的精神。“体方”是规矩方正，“用智”，就是运用知识。这两句来源于一个典故，易经上说“智以藏往，神以知来”。

“往”就是过去的事，“来”就是未来的事。章学诚说得很好。他对马班的区别，从形式上看，归结为“圆”与“方”。从内容上

看，归结为“神”与“智”。

司马迁思想的中心在“通古今之变”，他的成就也在这点上。“究天人之际”，有的地方好，有的地方也有迷信。“成一家之言”，他做到了，在历史著作上开辟了一条新路子。在“通古今之变”上，例子很多。如对于商鞅变法、吴起变法，传统上是否定的，司马迁却肯定他们的成就。对于秦始皇，西汉很少人说他好，认为正因秦坏，才有汉代。司马迁却说他“世异变，成功大”。这些例子都说明司马迁贯彻了“变”的思想。《史记》中到处有“变”的思想，最集中地体现在十表中。十表中，每表前面都有一个短序，一般人不爱看，不大懂，其实这是《史记》的精华，体现了“通古今之变”的主要思想。每个表，基本上都表示了一个历史时期。如春秋战国时期历史、楚汉历史、汉兴以后到武帝的历史等。每个表都表示出这段历史的特点。《汉书》不能掌握各段历史时期的特点，比较平板。

司马迁主张“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”。从开始原原本本追究，再看它的末尾，考察始末。从盛世能看到衰落的征兆，很不容易。如讲汉兴到武帝时，社会经济繁荣，但他说“物盛而衰”，说地主贵族腐化奢侈是衰象。汉武帝打匈奴得到胜利，匈奴跑了。司马迁记载时，虽不明说，却隐约写出汉的损失更大，老百姓吃亏受罪了。他认为用打的办法不能完全解决匈奴的问题。汉武帝晚期，山东各地方农民起义、暴动很多，司马迁如实记下来，言外之意是汉已出现危机，类似秦末情况。这是一般史学家不敢说的。后来，由于汉武帝改变政策，才缓和一些。这是司马迁的历史见解高明之处。

司马迁在讲历史变化时，很注意社会经济的关系、社会经济的重要性。在《货殖列传》中，提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其本身所

遵循的路子，不是行政命令能够勉强的。又说，人的社会地位、道德观念，总是受其经济地位所左右的。地位不一样，道德观念就不一样。他认为讲仁义是富贵人家讲的，老百姓没资格。司马迁这样一些看法，使他接触到了真理的边缘。对于社会变化的原因、社会地位的作用这些社会的根本问题，他都接触到了真理的边缘。他甚至模糊地触及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，当然司马迁不可能深入到真理的核心，不可能达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高度。他只看到事物的量变，看不到质变。有时甚至讲变，不是进步的变，还带有循环论的思想，对旧循环论的思想不能摆脱。但从史学史上看，司马迁的“变”的思想是光辉的思想，在当时能达到这样高度，已很不易。

《史记》中讲“通古今之变”，除十表之外，还有三篇，即《货殖列传》、《游侠列传》、《伯夷列传》。《伯夷列传》还很明显地反对天命论。

班固承担的时代任务与司马迁有区别。他把司马迁创立的“通古今之变”的优良传统抛弃了，代替的是“天人感应”的学说，这是继承西汉末年兴起的阴阳五行思想，跟他编定的《白虎通》的儒家思想是一致的。首先对汉代历史的看法与司马迁就不一样。司马迁认为汉代是从春秋、战国、秦、楚汉之争发展起来的。班固认为汉的传统是直接从尧那里来的，“汉承尧运”。他把历史发展按五行循环论去解释，把汉说成是继承了尧的传统，从而说明汉皇朝是承天命的皇朝，是上天决定的。照他的说法，东汉是西汉的继续，西汉是周的继续，不承认秦，也不承认王莽。班固认为秦与王莽的存在，好象年历中的闰月一样，不是正统，只是剩余的东西的拼凑，只是历史过程中的小插曲。当然，刘秀是正统，刘秀得天下是天命，理所当然。《汉书》开篇就是

讲汉高祖刘邦是得天命而做的皇帝。在《高帝纪》中记载有许多神奇的事情，而在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中没有。现在看到有一点，也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。《史记》中只是讲刘邦如何能干。《汉书》就强调天命。《汉书》一百卷，最末一卷是班固自己的传。第九十九卷是王莽的传，他把王莽是摆在末位闰月的地位。《汉书》讲刘秀继天命，得天下，是汉室中兴，天命所归。这可见班固是想通过历史的说教，把现行秩序稳定下来。因此司马迁处理历史问题时表现的一些进步的观点，在《汉书》中被抹掉了。如讲“游侠”，《史记》区分“游侠”中的不同人物，颂扬那些路见不平、帮助受压迫人的“侠”，反对那些仗势欺人的“侠”。班固站在皇家的立场，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“游侠”，一律认为非法。又如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，对于拥有物质财富的人，他们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起什么作用，司马迁作了说明，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。而班固则无区别地反对一切发财致富的人。

司马迁和班固的政治态度不一样，历史态度也不一样。司马迁是比较客观地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得出真正的经验教训，态度接近科学，政治上向前看。班固的态度是拿封建道德教条为框框，用历史事实去适应那些教条，再拿封建道德观念去评论历史。他的指导思想是唯心的，政治上是保守的、向后看的。政治态度和历史态度的不同，是马班异趣中一个最大的区别。

马班异趣的原因，不仅是因为时代不同。同一时代，也可以出现不同的人物。例如，同是在汉武帝时候，司马迁是进步的，董仲舒就不进步，开始神化政权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中的董仲舒传与《汉书》中董仲舒传不同，《史记》中根本不提董仲舒的“天人三策”，《汉书》原原本本地都写上去了。又如，班固和

王充也是同时代的人，班固比王充大几岁，同属于地主阶级，但王充著《论衡》，好多论点就是针对《白虎通》的，是比班固高明的。因此，马班不同除时代原因以外，还可以从家庭出身和本身的经历上找原因。

司马迁在自己的自传中说，从祖上到他这个时候，家庭没落了。原来家里做过将军，军事上有名望，政治上有地位，后来逐渐没落。他本身更受到压抑。他到过的地方很多，从陕西到东南、西南和北方。接触面宽，眼界也宽。班固是豪族出身，祖上在北方有几千群牛羊，在当地地位高。以后进入宫内，皇帝让他祖父管理藏书。班固作为贵族公子，思想感情是与皇朝相通的，倾向于保护皇家的权利。因此，班固的思想、出身与司马迁和王充都是不一样的。

同时，思想意识方面的东西，也有一个积累过程，有传统影响。对于社会影响，它有相对的独立性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他可以评论六家的优缺点，拿出自己的看法，今天看，基本不错。他对司马迁影响很大。班固家里是儒学世家，他的父亲班彪著有《王命论》，认为，按天命刘秀应当做天子。

三、八书和十志

《史记》中有八书，即：礼、乐、律、历、天官、封禅、河渠、平准书。《汉书》中有十志，即：律历、礼乐、刑法、食货、郊祀、天文、五行、地理、沟洫、艺文志。

书与志是论述典章制度的，称为书志体。这是史书中很要紧的一部分，是从司马迁开始有的。八书中最精彩的是《平准书》。《平准书》讲的是社会状况、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。《河渠书》